

漢文南亞史料學

Historical Data of South Asia
from Chinese Sources

耿引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漢文南亞史料學

Historical Data of South Asia
from Chinese Sources

耿 引 曾

北京大學出版社

漢文南亞史料學

耿引曾

責任編輯：何瑞田

*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學校內)

北京大學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10.875印張 270 千字

1990 年 7 月第一版 199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1,000 冊

ISBN 7-301-01127-X/K · 082

(平)定價：6.95 元

內 容 簡 介

本書在搜集中國載籍中的南亞史料基礎上，對有關南亞的漢文史料進行考訂、分類、闡述和評價，試圖把漢籍中的南亞史料整理出一個系統。全書按歷史時期分4個章節，其下再分正史、別史、雜史、史料雜著各類，予以介紹各種史料。漢籍中的南亞史料是舉世無雙的。它對歷史資料極端缺乏，而一向以寓言、神話、傳說來代替歷史的南亞人民將如獲瑰寶。它對研究亞洲的、特別是南亞的歷史文化，以及中國與南亞的關係，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同時，也為世界歷史文化寶庫添補了重要的精神食糧。

本作品系由“王安漢學研究獎助金基金會”支持的
研究成果。

序

季羨林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國中，中國同印度是僅有的兩個文化傳統迄今沒有中斷又對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國家。

但是這兩個國家却又又有極大的不同。印度人民想像力異常地豐富，寓言、童話非凡地發達，却對歷史興趣不大。馬克思說：印度幾乎沒有歷史。而中國則正相反。西方有人說，在文明古國中只有兩個國家有科學，其中之一是希臘。這是衆所周知的，另一個則是中國，而中國的科學就是歷史。

現在我們喜歡講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課題，中印兩國和其它國家的一些學者都努力在這方面探討、研究。但是談到歷史資料，在印度幾乎找不到什麼，而在中國則比比皆是，印度朋友們都寄希望於中國，中國的同行們則感到責無旁貸，應該把搜集整理的責任擔當起來。

過去已經有不少的中國學者在這方面努力過了。像張星娘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馮承鈞先生、向達先生的許多文章，都做出了光輝的成績，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但是系統地搜集、科學地整理，似乎還沒有開始。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的耿引曾同志從幾年前就開始了從大量的中國載籍中搜集整理有關中印文化交流的資料，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在已經裒然成集，成績斐然。耿引曾同志工作認真負責，細緻深入，而且虛懷若谷，經常和我討論一些問題，無間寒暑，鏗而不舍，終於取得了這樣的

成就，為今後不管那個國家的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學者提供了方便，彌補了多年以來就已經感到的一個缺憾。這是一件很值得祝賀的事情，我樂于寫這樣一篇短文，權當《序言》。

1988年10月24日

前 言

南亞和中國同是人類的發源地，遠在歷史黎明時期就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印度河和黃河哺育了南亞人民和中國人民，他們以智慧和勤勞創造賴以生存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豐富的精神財富，以擁有優秀的文化遺產而聞名於世界。南亞是佛教文化的誕生地，富於神話傳說。中國則形成了儒家學說，又是紙和印刷術的故鄉，雙方各有其特點。喜馬拉雅山和南海又從地理交通上把兩者緊緊聯繫在一起。從很早的古代起，通過雙方的商人、使臣、僧侶，這兩個地區相互之間就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在公元前的中國文獻中，就有關於南亞的記述，兩千年來一直綿延不斷。這些記述早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就為西方漢學家所注意和引用，在研究印度歷史、中印關係史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我國對這些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却一直未系統進行。直到70年代後期，隨着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建立中國的南亞學問題也提上了日程。在著名印度學學者季羨林教授的倡導與關懷下，開始組織人力，發掘、整理、編纂漢籍中有關南亞的史料，我作為一名園丁，有幸置身於這一課題的研究中。經過8個寒暑的搜羅抉剔，終於集成《中國載籍中的南亞史料匯編》兩冊。

《匯編》中所搜集的史料，反映中國載籍中保存的南亞史料之豐富，為任何其它國家所不及。歷史學家們熟知公元前4世紀末，希臘駐印度“大使”美伽斯蒂尼的《印度志》（原書已佚，僅在阿里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學》等書中保存了片斷。）是研究印度孔雀王朝時期的重要史料。而中國的這些史料比希臘的史料要豐富的多，珍貴的多。其中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法顯的《佛國記》早已膾炙人口，為所有印度史學家所引用。其

它散見各種典籍中的史料還有許多，如《漢書》中有對罽賓（今克什米爾）的詳細敘述，並記載着公元前2世紀，它已和中國互遣使臣了。《高僧傳》《續高僧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宋高僧傳》提供了西域南海交通的重要史實，《嶺外代答》記述了故臨（今印度奎隆）是北宋時期中國與大食的商業貿易中轉站，《搜神記》有天竺雜技傳入江南的描繪，《外臺秘要》保存有天竺藥方，《唐國史補》有師子國船舶的具體寫實，《元史》記有泥婆羅工匠阿尼哥在華的業績，《西洋朝貢典錄》中有溜山國（今馬爾代夫）專篇等等，真可謂舉不勝舉。這些史料是非常有價值的，仔細分析起來，除了有其連續性和系統性外，它們所反映的歷史問題自成一體，有其規律，既包括漢文記述的南亞各國歷史，也包括中國與南亞各國關係史。中國和南亞的關係可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其下還可分出友好關係、商業貿易、地理交通、佛教來往、文化藝術，甚至具體到梵學與漢語音韻等各個專題。因此，筆者在完成《匯編》之後，便想對《匯編》的史料進行考訂、分類、闡述和評價，把漢文中的南亞史料整理出一個系統，並能引導讀者對史料作進一步探討。恰好得到了王安漢學研究獎助金的資助，於是得以草成此書——《漢文南亞史料學》。

本書分4個章節，每章之下先介紹這一歷史時期的史料特點，後再分節。節下又以正史、別史、雜史、史料雜著各類，按成書時間的先後，分別評介其書。大體隋唐以前中國對南亞的記述偏重在佛教方面，以唐代達到了高峰。史料則以佚書和僧人著錄為重要，這類書多見於別史和雜史中。隋唐以後偏重在商業貿易上。史料則以沿海官員和下層官吏及民間著錄為重要，這類書多見於雜史中。對每本書，都首先簡略交待作者情況、成書年代及書的內容。次則介紹書中的南亞史料，並指出史料反映和說明的歷史問題。再則論述其史料價值，如遇重要的著作還介紹國內外的研

究現狀。然而，在寫作過程中，筆者深感困難重重。由於史料涉及的方面廣，宗教、哲學、歷史、語言、文化、藝術，以及天文、地理、農學、醫方等等無所不有，加上古老的南亞各國又是一個多民族、語言的地區，歷史又以分裂爲其主綫。古人記述的史料亦不乏穿鑿附會、荒誕不經之處，而本人學識淺陋，所知不多，因此寫作中時遇窒礙難通之處。大體說來本書在史料的介紹、分析、評價上，還能做一些嘗試，而在史料的考訂上則疑難太多，大多存而不論。如《魏書·本紀》中的南亞地名考釋，《續高僧傳》《宋高僧傳》中所提到的“乾文”是何種文字？都不得而解。這本小書如能在漢文南亞史料學的建立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則是筆者感到最大的滿足了。

寫到這裏，使我追憶起了一段美好的往事。那是1954年的10月14日，這一天秋高氣爽，風和日麗，在北京飛機場，我代表首都人民把一束鮮花獻給了來訪新中國的國賓、印度總理尼赫魯及其女英迪拉·甘地夫人。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還親自爲我作了介紹，他說：She is a stu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當時，我激動的心情是難以想像的，印中的友誼，總理的關懷在我20歲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我已進入‘知天命’的年歲，把這本《漢文南亞史料學》獻給南亞人民。願它也像一束鮮花根植在中國南亞古老關係的土壤中，永不凋謝。

耿引曾 1988年10月1日

於北京大學中關園

目 錄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公元前206—公元589年).....	(1)
第一節 兩漢的南亞史料.....	(2)
第二節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南亞史料.....	(12)
第二章 隋唐五代時期	
(公元581—960年).....	(100)
第一節 隋的南亞史料	(101)
第二節 唐的南亞史料	(104)
第三節 五代的南亞史料	(195)
第三章 宋遼金元時期	
(公元916—1368年).....	(204)
第一節 宋遼金的南亞史料.....	(205)
第二節 元的南亞史料	(252)
第四章 明清(止於公元1840年)時期	
(公元1368—1840年)	(296)
第一節 明的南亞史料	(297)
第二節 清(止於公元1840年)的南亞史料	(326)

第一章 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公元前206—公元589年)

這一時期從公元前3世紀末到公元6世紀下葉，中間大約經過了近800年。中國處於封建統一國家的西漢、東漢王朝、和分裂割據的三國、兩晉、南北朝。但此期間不論是統一還是分裂，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逐漸趨向頻繁，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外交通的開闢與不斷擴大，二是佛教思想文化進入中國。這兩方面都和中國與南亞的關係息息相關。這一時期中國和南亞關係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不少。如張騫通西域時，不僅從大夏了解到身毒的情況，還派遣了副使去身毒。又如法顯巡禮天竺，還有宋雲、惠生出使西域，到達乾陀羅國等等。有關這一類記述，見於同期成書的各種載籍裏。其中，法顯和宋雲留下了直接有關南亞的記錄，成為十分珍貴的資料。由於中國南亞關係日趨密切，有關記述日多，但年代久遠，原書佚失者不少，僅從其它的著錄中見到片斷。如《高僧傳》中所提到的一些赴南亞的僧人著錄，《水經注》裏所引用的一些著錄等，都很有價值。因此，搜羅佚書中的記述成了這一時期南亞史料學的特點之一。還應引起重視的是，這一時期的某些有關記述，涉及地理位置，事實真偽等，一時難下結論。有的問題，衆說紛紜已近一個世紀，至今還有分歧。如《漢書·地理志》中黃支的地理位置。又如《博物志》中的幾條材料，其中有關弱水的今地等，都需要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一節 兩漢的南亞史料

正 史

《史記》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史，成書於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公元前145——約公元前86年）之手。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祖上先輩常作史官。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初期的太史令。他青少年時期，遍歷名山大川，探尋古迹，進行考查，掌握了豐富的知識。38歲時正式受命為太史令，這又為他提供了閱覽宮廷圖書檔案的機會。所以，後來他能寫出歷史學上的不朽著作——《史記》。

該書是一部紀傳體通史，計有52,6500字，記載了上自軒轅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年間上下3000年的史事。內有《本紀》12，《表》10，《書》8，《世家》30，《列傳》70，共130篇。《本紀》是以帝王為中心，用編年的形式，寫出一代大事。《表》是各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書》以敘述社會制度和自然現象為主體。《世家》記貴族王侯的歷史。《列傳》則記不同階層，不同類型各種人物的歷史。應引起注意的是司馬遷還為少數民族和鄰近國家列傳，其中不僅有《匈奴》、《南越》、《西南夷》等列傳，還有《朝鮮》和《大宛》的專傳，並對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亞國家和大夏、條枝等西亞國家的源流和概況作了扼要的記述。在這些記述中，我們看到了有關身毒（古代印度）的論述。

《史記》中的身毒首見於《西南夷列傳》，次見於《大宛列傳》。《西南夷列傳》中的記述是：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枝，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開出西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大宛列傳》中的有關記述是：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揭水南。……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枝、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扜罽及諸旁國。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

以上是中國史書上最早記載的有關南亞的幾段史料。這些史料的來源出自張騫。張騫曾於建元3年（公元前138年）、元狩4年（公元前119年）兩次出使西域。歸來後，帶回了遠西諸國的消息。司馬遷與張騫是同時代人，史實的記載應該是可靠的。再從

身毒首先見之於《西南夷列傳》來看，也可說明材料的真實。因爲司馬遷對西南夷並不陌生，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他曾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到達昆明，去安撫那裏的少數民族。他把身毒的記載附於《西南夷列傳》中，證明他對身毒的方位有正確的理解，也確信有一條從四川、雲南通身毒的道路。因而才記錄下這些材料。

上述史料有着很高的價值，它是公元前2至1世紀的記錄，距離今天已經有2000多年了。說明公元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已有商業貿易往來，當時的中印交通除張騫鑿通的西域道外，還有雲南天竺（古代印度）道的存在。它還是中國派使節到印度的明確記錄，在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曾派副使到身毒。在張騫死後，武帝不止一次地遣使去身毒等國家。史料也記錄下了張騫所了解的身毒情況。這是中國人對印度的最早認識與了解。這些，爲研究中國南亞關係史、古代印度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在此，還要交待有關雲南天竺道的問題，也就是早期中、印、緬的交通。幾十年來，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著^①已不少見，但以饒宗頤先生的“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②最爲周詳。他較全面地綜合了中外學人的論述及考古發掘材料，從“僂越與盤越、剽國，Kautilya書中之Cina及其年代，氏闕、蜀細布、與哀牢桐花布，雜論中印緬交通，補記，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幾個方面，對漢文資料作了進一步的考釋，論之有據，很有啓迪，值得認真閱讀。

《漢書》

繼《史記》之後的正史是《漢書》。《漢書》主要的作者是班

① 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中華書局1955年。夏光南：《中印緬道交通史》中華書局1948年。

②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4分冊。

固（公元32—92年），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出身於仕宦顯貴之家，父親班彪爲司徒掾，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有志於編寫史書，曾作《史記後傳》65篇。建武30年（公元54年）班彪死後，固居喪在家，繼其父業。後任校書郎，蘭臺令史等職，并奉皇帝之命編寫《漢書》。經過20多年的努力，在章帝建初7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尚有8《表》和《天文志》未完稿。後來他因受外戚竇憲事件的牽連而被捕，死在獄中，未完稿由其妹班昭等續成。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計有80萬字，記載了漢王劉邦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4年（公元23年）229年的史事。它的體裁略不同於《史記》，將《書》改爲《志》，《世家》併入《列傳》。從此，中國修斷代史都以紀、表、志、傳體例爲標準形式。全書有《本紀》12、《表》8、《志》10、《列傳》70，共100篇，班固《漢書》承襲《史記》，但也有許多創造，如改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史記·平準書》爲《食貨志》；新立提供研究學術文化書目的《藝文志》及記全國地理的《地理志》。《漢書·地理志》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爲主體的歷史地理專著，上自《禹貢》、《周官》的九州，下至秦漢郡縣封國，其來龍去脈及風土人情都有載錄，尤其是包括了海外交通，中國與南亞的海上交通記錄即首見於此。另外，班固繼承了司馬遷記述鄰國歷史的優良傳統，把《史記·大宛列傳》擴大爲《西域列傳》，在《西域列傳》中保存了研究古代南亞的史料，彌足珍貴。

《漢書》中的南亞史料，在《平帝紀》中有“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的記錄。《地理志·粵地條》末段有自徐聞、合浦抵黃支路線的記述。《西域傳》中有對烏秣國、罽賓國、大月氏國等的描述。這些史料的可靠性強。因爲《漢書》的材料除採用《史記》的記載外，其中的一些篇章原出自班彪的手稿，而班彪是有機會看到官府所藏秘籍的人。班固整理了父親的遺著，後

來他自己又擔任了校書郎和蘭臺令史。蘭臺是宮中藏圖書秘籍的處所。蘭臺令史管典校圖籍、掌奏及工印、文書等職。他更可以根據第一手資料編寫《漢書》。另外，時事見聞也豐富了班固的知識，如其弟班超是征服西域 50多個國家的漢朝一代名將，《西域傳》的寫成可能有他提供的材料。

《漢書》中有關南亞史料最重要的是《地理志·粵地條》末段所記：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謫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這一段材料引起中外學者的重視。它主要說明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初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海上交通路線；其中直接反映南亞的有漢使抵黃支的來回路線、黃支概況、中國與黃支的外交關係，以及漢使歸程經過的已程不國。

關於黃支和已程不的方位，考證它的不乏其人。對黃支，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爲是在東印度海岸的建志補羅，即今天的康契普臘姆 Conjevaram。這當歸功於藤田豐八^①和費瑯^②，中

① 藤田豐八：“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見何健民譯本《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② 費瑯著馮承鈞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華書局1957年。

國學者馮承鈞^①、韓振華^②等人也立論同意此說。其它說法還有不少，有人認為黃支在印度境內克里希納河Kistna R、入海口的維查雅瓦達Vijayavada一帶^③，也有人認為黃支國是恒河國家^④。此外，還有人主張在波斯灣頭的霍木茲^⑤，或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亞齊^⑥，或在馬來半島^⑦，然馮承鈞認為“黃支為建志一說似不易推翻”^⑧。

已程不國的具體方位，說法也有好幾種。今天看來，定為斯里蘭卡是有其根據的，提出此見的是翦伯贊^⑨。繼之，蘇繼傾^⑩又從漢文與巴利文的對音作了進一步推論。後來韓振華^⑪再從古漢語音韻上推敲，完善了此說。其它的說法還很多，有認為是今印度東南部的欽格爾普特Chingleput^⑫，也有人認為是今印度的柯欽Cochin或西南海岸的基圖爾Kittur^⑬，還有認為在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⑭，更有認為在今非洲的埃塞俄比

①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

② 韓振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未段》漢釋”《廈門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

③ 蘇繼傾：“《後漢書·南蠻傳》究不事人即東埔塞人說”《學藝》第17期5號。

④ E. M. 梅德維杰夫, Б. П. 李福清：“評石鐵英著《古代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文化交流》（公元3世紀前）”《中外關係史譯叢》第1輯第275頁。

⑤ 引自《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第694頁。

⑥ B. H. M. Vlekke; Nusantara, a History of Dutch East Indies 第12頁。

⑦ 勞幹：“論漢代陸運與水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第89頁。

⑧ 《中國南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

⑨ 《中國史綱》上海大學出版公司1947年第2卷。

⑩ “《漢書·地理志》已程不國即錫蘭說”《南洋學報》第5卷第2期。

⑪ “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未段》漢釋”《廈門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

⑫ 岑仲勉：“課餘讀書記”《聖心》校刊第1期第138頁。

⑬ 藤田豐八：“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見何健民譯本《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⑭ 韓槐準：“舊柔佛之研究”《南洋學報》第5卷第2輯第9頁。